

观史

□ 本报记者 卢昱

“青春没有售价，泰山就在脚下” “人这一生总要来一次泰山”“泰山大舞台、有梦你就来”……这些爆火的网梗显示古老的泰山已成为青春打卡网红地标。

泰山见证并记录着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和象征，也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缩影。而由泰山生发的诸多概念，也在潜移默化中赓续。在明末清初的济阳籍学者张尔岐所著《蒿庵闲话》中，特别提到如何测量泰山的高度。当时，面对朝代更替、西学东渐的社会现实，张尔岐给出自己的种种思索。

恬熙意象，令人神往

《蒿庵闲话》书稿成于康熙九年(1670年)，是张尔岐笔录读书所得，也有议论考据之作。虽然有些考据和观点被同时期著名学者顾炎武所称道，但毕竟是一部学术笔记，加之作者并无显赫功名，影响不是很大。在该书中，张尔岐摆出历史：“泰山高四十里，其说本之《汉官仪》云，自下至古封禅处四十里。郭璞书又云，从山下至顶四十八里三百步。”

张尔岐由此展开，山东按察司张五典对泰山高四十里的说法不大信服。张五典在山东任职期间，多次赴泰山考察。为测出泰山实际高度及里程，张五典精心制定测量方案。他用刻有尺寸的1丈长竖竿，端置一铁环，再用1丈长的横竿，在中间置一铁环。把绳子系在横竿环上，再穿在竖竿环中，牵动绳子，可使横竿上下而不失平衡。在竖竿所立的地方，看横竿所至的地方，以5尺为1步，测量远近。若在平地，横竿便两端着地；若遇斜坡，横竿便前端着地，后端悬空，由竖竿刻度可知悬空尺寸，测出高度。再用记录簿，每页画360个方格，每量1步，则填1格，遇平地填“平”字，遇斜坡就注明高度，每填满1页，合1里路程，填写页数即为泰山里程，累计高度即为泰山高度。

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张五典曾派员到泰山实测，从山下至绝顶，设4300多个测点，最后得出结果：泰山里程“实一十四里八十余步”，高度“三百六十八丈三尺四寸”。按当下的数字估算，当时泰山玉皇顶与泰安城区的相对高度差约1215米，用现代科学方法测出的相对高度差约1400米。在明末，当时人们对泰山里程和高度的测算，数据与现在都较为接近。

张尔岐由此感叹：“过去人们常说泰山有四十里长，但实际上这种说法究竟依据什么来定呢？由此推断，世间有许多不可完全相信的说法，情况大抵如此。测量山脉的方法，在世上也有使用标杆影子和勾股定理进行累积计算的，但都不如实际测量那样准确可靠。千百年来人们的主观臆测导致的错误认知，一旦被纠正，确实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



情，而且那种宁静美好的景象，更加让人神往。”

张尔岐“其一时恬熙意象，更令人神往”的感悟，既有对过去不准确描述的怀疑，也有对实证重要性的强调。在他生活的年代，面对朝代更替、西学东渐的社会现实，山东的士大夫阶层中兴起了一股实学思潮。

必须指出的是，当时的山东士人虽推崇西洋历法，但对西学采取的是一种实用的态度，并非一味盲从，尤其是对西方传教士传播的天主教更是缺少兴趣。

张尔岐对西洋历法重实测的方法给予了充分肯定，反对当时朝廷中以杨光先为代表的保守派士人对西学全盘否定的态度，主张采用对国计民生有用的西学。同时，他又坚决反对西方宗教的输入，以为西方“历象器算，是其所长，君子固当节取；若以道术，吾自守家法可耳”。当时，很多像张尔岐这样深受儒学熏陶的山东士人，他们对西学采取了一种欣然接受的态度，但重在西学实用价值的追求，这与南方某些士人热衷西学并不惜改信天主教有明显差异。

欲倡正学于天下

清初山东士人重视实学研究，主张经世致用，出现了像张尔岐这样的经学大师以及大批经学、史学和方志著作。张尔岐被称为“山左第一大儒”，他用三十年时间研究《仪礼》，完成《仪礼郑注句读》十七卷，使宋代以后几成绝学的《仪礼》发扬光大。

张尔岐钻研经学并非仅为了研究古人著作，而是“深于汉儒之经而不沿训诂，邃于宋儒之礼而不袭语录”，是“欲倡正学于天下”。他提出士人治经研礼，首先要探究古人苦心著述本旨，从古人所著《仪礼》等书包含着的自然秩序、人伦纲常、典章制度、言行举止、风俗民情等内容中，找出适合当今社会发展的模式，匡正明末以来社会秩序的混乱和空疏学风的泛滥。

完成《仪礼郑注句读》一书，张尔岐耗时近三十年。他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对《仪礼》及郑玄的注释进行了详尽的句读和阐释，使原本晦涩难懂的古文变得易于理解，为后人学习《仪礼》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这部著作还考证校订了监本和唐《石经》中的脱漏之处与错误，补充内容、改正错误多达数百处，为后世学者在古籍整理和考证方面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顾炎武评价该书“根本先儒，立言简当”。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张尔岐临终之前念念不忘：“《仪礼》欠一净本，若于一二年内能为之，吾无所憾”。如此执着精神，实在令人感佩。该书于乾隆八年(1743年)高廷枢刊行世，后被收入《四库全书》，自此产生广泛影响，整个清代的《十三经注疏》中《仪礼》部分大都采用张尔岐之说。

张尔岐对后世的礼学研究影响极大。2024年底，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终身教授、

当代著名经学家沈文倬所著《沈文倬批注仪礼郑注句读》出版，沈文倬对张尔岐的文本进行多维度的解读。

尽吾力之所可至

回望历史，张尔岐试图以理学精神正人心，矫学风，易风俗，重建建立程朱在学术界的权威。最引人注目的是，张尔岐与同时期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夫之，在诸多观点上有“不约而同”之处。

在张尔岐之前两千多年，大思想家荀况谈论过“天”“人”关系。荀子把“天”描绘成压在人们头上的一口大锅，宣扬“天道不可知”“人不可与天争”。他说，人们要明确“天人之分”，即天有天职，人对此无能为力。与此论点相比，张尔岐的论点明显进步很多。

张尔岐从驳“天道不可知”开始，指出“天道不可知”的论者是一些具有颓废人生观的人，他们嫌“天道”不公，善恶祸福都不应验，所以他们说“天无道”。张尔岐认为这样理解会“哀君子之心，作小人之气”。他认为有必要从社会道德的需要出发，把问题提到哲学层面予以谈论。

对此，张尔岐的切入点是“天人相及”。荀况虽然也谈“天人之分”，但张尔岐首先给问题下唯物基调，说天、人之相及，是问题。什么是“气”？就是运动中的物质。他说“天”以其气寄于人，而出现了“质”，质立而兴起了“事”，事的衍变就成了“势”。

非常凑巧，王夫之也非常喜欢讲“势”，他说“势”字“精微”。张尔岐说，人世间的善恶祸福，处处都与“势”相关。具体说，就是以“气”授人，人接受了这种“气”就成为“命”。气有清浊、长短、多少，命也就有屈伸。王夫之说“化在天，受在人”，天不停地授命于人，人不停地受命于天，王夫之把这叫“凝命”。

经张、王这么一讲，神秘的东西物质化了，死的、机械的东西活灵活现了。张尔岐更进一步说，事积起来成为势，但不是千篇一律的，要看所积的“分”，包括数量和质量，积至其分则成势，势成则天道应。所以，关键在人自己的“自致”，或“尽吾力之所可至”。用现代哲学的词汇表达，量变与质变的转化决定是否势成。

如此一来，人们的主动性得到大大提升。张尔岐告诉人们，“天命”不是预先定好的，不是死的，而是活的，可以争取的，天命是可以人为调整的。这种思想自然而然导向乐观和积极的人生。

在张尔岐、薛凤祚、李焕章等士人倡导下，清初山东士人研究经史、撰写志书者众多，一时形成一种治学热潮。尤其是薛凤祚、张尔岐、李焕章等山东士人力邀著名实学大师顾炎武加入山东官府组织的《山东通志》撰写队伍中，并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了这部现实性很强的力作，成为清初山东学界的一件盛事。

这些人大都追求科学，主张研究学术为现实服务，但又表现出含蓄、慎重、不激不亢的姿态，展示出社会大变革时代孔孟故里士人们的典型风格。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尤其是科学知识传播和技术发展的限制，这些“节取西学”“自守家法”的种种努力未能引发更大规模的社会变革或科技革命，但张尔岐等人倡导的思想解放和追求科学的精神，激励着后来人勇于质疑传统、开拓创新。

给泰山量「身高」之后



“三皇五帝”，来自嘉祥一座祠堂

□ 本报记者 张依盟 本报通讯员 朱卫华

嘉祥县纸坊镇武翟山北麓的武梁祠发现了目前最早关于“三皇五帝”的形象记录。可别小瞧这几幅图像，无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是教科书，只要涉及大禹和黄帝图像，都以武梁祠为蓝本，它被认定为中国传统文化标志性图案。

武氏墓群石刻博物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武梁祠，是东汉隐居乡间的儒士武梁的家族祠堂。汉代实行举孝廉制度，行孝突出的人可通过推荐出任做官。武氏一家世代为官，是显赫一方的官宦人家，民间又崇尚“厚葬为德，薄终为鄙”。建于东汉晚期的武氏家族墓地正是这种社会风气的产物。

纵观武氏家族墓地的整体平面布局，首先看到的是双狮子，后是双阙，然后是神道，通往祭坛及诸墓。每座墓前是墓碑，其后为祠堂，最后是坟墓。武梁祠周围至少存在三座武氏家族成员的祠堂，过去统称为“武家林”，如今作为文化遗存被定名为：武氏墓群石刻。

武梁祠，是如何被发现的？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运河河官黄易查阅县志时，发现一段记载：“县南三十里紫云山西，汉太子墓石享堂三座，久没土中。”黄易好古，尤嗜

金石，随即前往。而后推断，石刻并非汉太子墓，而是已经消失了一千多年的武氏祠。

它为何保存如此完整？两宋年间，为抵御金人，宋人无奈开决黄河大堤，嘉祥黄水泛滥，以致当年相当精致、完整的石室最终湮没于地下。黄易发现武氏墓地后，立即组织挖掘并建房保护，还利用自身影响力，对武梁祠的价值进行传播，扩大了武梁祠的知名度；晚年即便是经济拮据，他也没有典当任何一件武梁祠的文物。今人能够一睹雄伟壮观的武梁祠，黄易居功至伟。

一处现存于村镇中的汉代家族祠堂，到底魅力何在？

武氏墓群石刻博物馆第一展室(也称阙室)，保存有三个“全国之最”：子母结构的石质双阙是武氏家族墓群的大门，是目前中国保存最完整的汉代建筑，被誉为中国古代建筑的活化石，亦有“石质汉书之美誉”，也是现存唯一一对保存完整的汉代子母阙。展室内的武梁碑与无字碑，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汉碑之一。而立于石刻群之首的石狮，是中国有确切年代记载的最早石狮造型艺术珍品，被誉为“中华第一狮”。狮子由汉代张騫出使西域后传入中国，武氏祠内的这对石狮，正是千年丝绸之路与中西文化交流有力而古老的见证，具有重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步入武氏墓群石刻博物馆第二展室，陈列的武氏祠汉画像石，宏伟壮观，是一部刻在石头上的“史记”。

武氏墓群石刻汉画像内容丰富(主要包括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和现实生活三个方面)、取材广泛，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汉代及其以前的社会状况、风土人情等。在同一个家族祠堂里，出土汉画像石之集中、数量之多、雕刻之精美，在中国无一例。其“画像古朴，八分精妙”，代表了汉代石雕艺术的最高水平，是千年来众多研究者的焦点所在。

它如一本“历史漫画书”，以荆轲刺秦王图为例，画像中，荆轲在左，秦王在右。荆轲刺秦王时，第一下划掉秦王的袖子，画像中此时袖子还未落下。第二下刺中柱子，画像中此时剑穗还飘在空中，荆轲怒发冲冠，秦王环柱而走。画像记录下秦王欲向身后拔剑而未拔出的时刻，既具有艺术性，又印证了《史记》的记载。

正因如此，武梁祠丰富的文化内涵、精湛的雕刻技艺不仅是中国古代艺术的旷世精华，更是全人类不可多得经典性文化遗产。与同时期埃及石刻、希腊瓶画一同享誉世界，共同构成了人类文明的璀璨星空。前不久，武氏墓群石刻博物馆入选山东省十大考古研学打卡地，值得一探究竟。

视频请扫描二维码观看



宋朝的“外卖”

□ 汪霏霏

提到外卖，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手机与网络。其实，外卖这个行业非常古老，早在1000多年前的宋朝，外卖就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生，且蔚为壮观。

宋朝的外卖叫索唤，宋人曾自豪地说：“市食点心，四时皆有，任便索唤，不须主顾”——要是不想自己做饭，不论春夏秋冬，从早到晚，都可以叫外卖。张择端在《清明上河图》中，就画有一位外卖小哥模样的人，穿着围裙，右手拿着筷子，左手拿着两个食盒，从虹桥边的“脚店”出来，利索地走在街上，看姿态是刚接了“外卖单”。

那时的外卖，究竟要如何下单，商家做了又如何配送呢？

宋朝大街上酒楼饭店不计其数，各家各户为了争夺客源，除了饭菜一定要好吃，服务也得到位。有些有钱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并不想自己出门去酒楼吃饭，便会让自家的下人，带着拟好的菜单，去指定的酒楼下单。酒楼最喜欢这种身份尊贵又有钱的客人，当然会来者不拒，这种模式越来越规范，哪家今天想吃外卖，只管提前把菜单送去，等到了中午或者晚上饭点，酒楼便会安排人送菜上门。

随着普遍程度的提高，外卖业自然就应运而生。酒楼为了揽客，还派人去一些听戏听曲的地方推销，主动挨个上前询问饿不饿，是否需要外卖点餐服务。外卖员只需要记录客人的姓名、位置、所需餐食，几个人多的地方跑一圈后，看着饭菜数量差不多了，就赶紧返回酒楼帮客人下单。其细致程度绝不亚于现在。比方说，为了让客人吃到热腾腾美味的饭菜，酒楼发明了一种保温餐具叫“温盂”，最里面那层用来盛菜，外面有一层放入热水用于保温，这样不至于下人把菜带回家，饭菜都凉透了。这种配送的餐具是回收使用的，非常环保。在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中就有多件“温盂”的文物展示。

北宋末年首都汴梁，有位宋五嫂开着一家鱼羹店。靖康之变后，她和其他很多汴梁人一样南下逃难，最终在临安落脚，继续以售卖鱼羹为生。她把店开在西湖边上，宋高宗赵构坐船游览西湖，就曾点过她家外卖，宋五嫂亲自送到船上。鱼羹经过高宗“御赏”，一下变成了当时的“网红美食”，人们奔走相告，宋五嫂因此成为富婆，“钱塘门外宋五嫂鱼羹”也成为当时杭州的餐饮名店。元人张雨的《西湖竹枝词》：“光尧内禅罢言兵，几番御舟湖上行。东家邻舍宋大嫂，就船犹得进鱼羹”，说的正是这个典故。

像宋五嫂一样从汴梁来到临安，在史料上留下名字的还有羊肉李七儿、奶房王家、血趾羹宋小巴、李婆婆杂菜羹、贺四酪面，事实上，南宋临安的大部分餐饮名店，都是汴梁人开所开设，如《都城纪胜》所称“都城食店，多是旧京人开张”。淳熙五年(1178年)二月，宋孝宗赵昚去德寿宫探望已经退位做太上皇十多年的赵构，赵构点名叫了李婆婆杂菜羹、贺四酪面、脏三猪脆胡饼、戈家甜食等外卖，品尝后非常满意，说：“此皆京师旧人，各厚赐之。”

当时皇帝要钱要物，称之为“宣索”或“宣唤”，因此皇帝叫外卖就有特别的名字“宣索市食”或“宣唤买市”。宋高宗经常从市井叫外卖，使得各家餐厅更加重视餐饮品质，不敢苟且草率，无形中提升了临安餐饮的整体质量，这也算是为中国餐饮业做出了一点点贡献吧。除了前面提到的美食，当时临安孝仁坊口的水晶红白烧酒，瑜石车子卖糖糜糕洗等食物，也都曾被宣唤。宋孝宗“宣唤”过的市井美食，见于记载的有李婆婆杂菜羹、南瓦子张家团子。帝王尚且如此，可以想见当时权贵大臣、富裕人家叫外卖的情形就更加普遍了。被帝王点名“宣唤”过的店铺自然深以为荣，会在店铺门口醒目处挂上写着“曾经宣唤”的招牌。

宋朝人点餐叫外卖已经够先进的了，但你敢相信，宋朝也可以叫外卖医药？医馆药房的外卖服务，只要病人提供药方，并说明用药时间和病人的住址，药房抓完药可以在自己店里为客人熬药。熬好之后再用保温容器给病人送到家，这种服务在宋朝很受欢迎。

宋朝还有送热水的外卖，这也令人意想不到，就是普普通通烧好的热水，有些比较懒的家庭，不想一大早起来烧热水，就会直接下单，第二天就有人专门送热水上门，简直不要太方便了。除了这些，还有送花上门的，宋朝人喜欢插花，一些女眷在家没事干，就买一些鲜花让人送过来，定期在家里搞插花，很有同情雅致。还有上门定制衣服的，亲自带着布料上门，量体裁衣，做好了再派人亲自送上门来，这都算是“外卖”。

那么，宋朝又是怎么招收外卖员的呢？大户人家叫外卖，大抵都由私家仆人出面；普通人家则可以提前差遣专人前去购买。当时这种专门负责点餐送餐的外卖小哥称作“闲汉”，他们工作认真、服务周到，会风雨无阻送餐上门。此外，旅店的店小二，也可以为住客提供即时的跑腿服务。因此每到餐点，就有很多手提美食的人在坊间穿梭。甚至可以足不出户隔窗索唤，因为每到餐点众多流动食贩沿街叫卖熟食，有鹅、熟羊、鸡鸭、羊血、灌肺等快餐，“就门供卖，可以应卒之需”。只要打开窗户，吊个放着外卖钱的小竹筐下去，就能把满满一筐外卖提上楼。

在宋朝，城市人口以及市民阶层持续增多和扩大，形成了很强劲的消费群体，让消费市场变得繁荣起来，所以外卖发源于宋朝，这和宋朝经济发达息息相关。

(作者系山东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文物志 小城博物馆



● 石狮

